



观音山一隅

观音山植树记

□梁平

从记事起,几十年的时光里,我亲手种下的树竟不超过5棵,每每想起,总觉得羞愧难言,这份遗憾也在心底一直萦绕。每年植树节如期而至,可真正能在这个节日里付诸行动的人又有多少呢?哪怕只是种下一棵,若能坚持,也不会如我般寥寥。很多时候,我渴望能找到与自然对话的方式,而植树这个看似人可为却又不易践行的举动,或许能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

当得知重返东莞樟木头观音山的行程里安排了植树活动时,我心中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仿佛这是我与观音山注定的缘分。素有“南天圣地、百粤秘境”美誉的观音山山势雄伟,层层叠叠的绿色绒毯更把观音山包裹得严严实实。

观音山森林总面积达2.7万亩,森林覆盖率超过92%,上千种植物在这里共生共荣。野山茶花娇艳欲滴,红的似火,粉的如霞;白桂木、野生龙眼、苏铁蕨还有密集的桑科等原始植物,威武浩荡。针阔混交林层次分明,不同树种的枝叶相互交织,高大的桉树笔直向上,欲与天空试比高。

我第一次进山已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在山上留宿一夜,夜晚山风拂过,那林涛就是大自然原创的诗歌,起承转合,抑扬顿挫。那个夜晚,观音山上的树都仿佛栽种在我的心上,这片山林在我的记忆里开始生根发芽。

此次重返观音山,结伴而行的都是老友。徐永祥、陈世旭、何立伟、胡性能等,加上我,八个男人,恰似八大金刚。这阵容不禁让我联想起观音山上八仙游历的传说。传说中,八仙曾游玩于此,不小心将花篮中的花洒落在观音山上,转眼间,这些花苗便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最终长成了茂密的森林。而这里的植

被仿佛沾染了八仙的灵气,在树的形态上,总能找到八仙的影子,或站立,或行走,或躺卧,八仙的神韵呼之欲出。这个有趣的联想让我窃喜许久,觉得自己好像也成了传说,将在这片神奇的山林中留下独特的印记。没想到,这奇妙的联想竟变成了现实——此次行程安排了每人在山上种一棵树。

能够在观音山种下一棵树,意味着十年前种在我心里的那棵树终于有了归处。我要将这份对自然的热爱、对观音山的眷恋,实实在在地种在这片土地上。更让我欣喜的是,这天恰好是我的生日。

工作人员专门为我们讲解了植树的技巧和注意事项,看似简单的植树实则大有学问。首先是选苗,要挑选根系发达、枝干健壮且无病虫害的树苗。其次,挖树坑也有讲究,树坑的大小和深度要根据树苗的根系来确定。一般来说,树坑的直径应比树苗根系展开后的直径大20厘米至30厘米,深度要比树苗的根颈处深10厘米至20厘米,这样才能为根系提供足够的生长空间。挖好的树坑底部要稍微踩实,防止树苗栽种后下沉。

上山半道,一片斜坡上矗立着一块醒目的石碑,上面刻着“文化艺术林”几个大字。我们抵达时,映入眼帘的是蒋子龙先生种下的树,树上悬挂的标牌在风中轻轻摇曳,好像蒋子龙先生在向我们招手。环顾四周,这片空置的地块上已有十几棵树,每棵树旁都立着标牌,上面镌刻着作家、画家、书法家们的名字,这些熟悉的名字仿佛在邀请我们加入观音山上这片人文与自然融汇的阵营。

我们要栽种的树已经提前运达,询问后得知,我即将栽种的是一棵火焰树。我对树木的认知有限,赶忙上网搜索,才知晓这是

从国外引进的树种,别名众多,有火烧花、喷泉树、芭萼木、火焰木等,如同有些作家一生用过许多笔名。在这些别名中,我独爱“火焰树”这个名字,它仿佛带着一种炽热的生命力,让人充满期待。眼前这棵火焰树虽还是幼树,却已有两米多高,树干笔直挺拔,像是位英姿飒爽的少年。树梢上的翠叶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微风拂过,叶片轻轻舞动,活泼而灵动。

树坑早已按照标准挖好,大小适中,深度刚好能容纳火焰树的根系。我们小心翼翼地将树苗搬挪至坑中,确保树苗的根颈处与地面齐平,这是栽种的关键,根颈处理得太深或太浅都会影响树苗的生长。随后,我们轻轻地撕掉树根上包土的薄膜,让树苗的根系能够自由地呼吸。接下来,我拿起铁锹一铲铲地将泥土填入坑中,填土分多次进行,每次填土后都要浇少量的水,让泥土充分湿润,以便根系与土壤紧密结合。填完土后,再用手轻轻拍打、压紧泥土,确保树苗能够扎根稳固。最后浇上一桶清水,浇水时要缓慢均匀,让水充分渗透到土壤中,直到树坑表面出现积水为止,这被称为“定根水”,对树苗的成活至关重要。

一切就绪后,我郑重地挂上自己的标牌,那一刻,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仿佛完成了一件无比神圣的人生大事。环顾四周,同行的老朋友们也都完成了植树。大家满鞋沾泥带土,裤腿上也溅满了泥点,可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那笑容如同绽放的花朵,笑声响在山林间,与鸟鸣、风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曲欢快的乐章。

从山上种树下来,我们前往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古树博物馆,这是全世界迄今唯一的古树博物馆。从栽种一棵年轻的树,到凭吊一片倒下的年迈的树,我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

这里陈列了60棵具有科研价值又有观赏价值的地下埋藏古树,它们静静地在地上、在展柜中。这些古树中最年迈的已有5000岁高龄,最“年轻”的也有200余岁。为了让我们能亲身体验五千年来我国岭南地区的气候冷暖变化周期,博物馆精心营造了与当时气候环境相应的氛围。每个区域出土的古树都按生长年代排列摆放,真正实现了“树说历史”,让人一目了然。我在一棵长8.1米、树干周长2.77米的青皮石化树前驻足良久,这棵来自距今五千年、黄帝时期的“老人家”,外层已失去约1/3,遗留下来的树轮还有300多圈。它的身躯已不再完整,却像是一位历经沧桑的智者,表情沉稳而深邃。我凝视着它,无法与它对话,但我能感受到它身上承载的岁月重量,读得懂它的满腹经纶。

据说两千多年前,迦毗罗卫王国的摩诃摩耶王后,就是在火焰树下生下了释迦牟尼,这个传说在诸多文字中都有记载。正因如此,火焰树引进中国后,在西双版纳那边,几乎每个傣族村寨都建有寺庙,而寺庙周围也都遍种火焰树。每到冬春之间,火焰树便会绽放出形体硕大的红色花朵,点燃人们心中的梦想与愿景。有些渴望子女的人家,还会在房前屋后种植火焰树,将其视为福祉,虔诚地顶礼膜拜。

年过花甲,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在家乡过生日,却在观音山种下一树“火焰”。我相信,这棵树会在充满灵气的土地上茁壮成长。那跳动的“火焰”,将生生不息,温暖我未来的每一个日子,也将成为我与观音山之间永久的牵绊。

■作家故事

中秋节,月光漫进窗来,忽然就想起了红柯——那个总是眯着眼、低头走路的人,已经离开七年了。作为你一直以“叔”相称、现在也喜欢写点东西的人,红柯,在这个月圆人团圆的日子,我想起了你。

第一次见红柯,是1985年秋天。我在宝鸡文理学院组织部工作,常看见一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在宣传部门口进出。他走路微微低着头,说话时眼睛眯成一条缝,有时架着副眼镜,有时又徒手揉着眼睛,模样介于学生和老师之间。后来才知道,他叫杨宏科,中文系刚毕业留校。

没过多久,办公楼里那个低头沉思的身影消失了。听说他去了新疆,像一粒被风向西北的种子,在奎屯落了脚。那时的我忙于琐事,渐渐忘了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年轻人。

再见已是十年后。我调任校纪委书记,有一天办公室门口有人徘徊——还是那个微低着头的姿势,还是那副沉思的模样。是杨宏科回来了。他搓着手,语气温和地询问爱人工安排的事。我告诉他我不分管人事了,他也简单说了这十年在新疆的情况,却只字未提自己已成知名作家。临走时,他依旧低着头,背影里似乎藏着生活的重量。

直到有一天,家乡两个高考生来找我,说要报考文理学院中文系,因为仰慕作家红柯,我才恍然大悟——那个总是低头走路的杨宏科,就是文坛上新锐作家红柯。从那以后,我慢慢拼凑出了作为作家的红柯在新疆的漫漫十年。那些低头走路的日子,那些藏在局促背后的沉默,应该都化作了他笔下娓娓道来的文字。

红柯待我不同旁人。在学校,别人都叫我“老师”或“书记”,唯独他叫我“叔”,叫我夫人“姨”。这称呼来得自然,仿佛我们不是同事,而是同村隔壁的邻里。他来找我时,从不客套,就像傍晚来家吃碗面那样随意。

记得校门口梧桐叶落满地的那个秋天,我看见他在碎金般的落叶里来回转悠,背着手,脑袋埋得很低,皮鞋尖碾着枯叶。我拍拍他胳膊,问:“在这儿转悠啥?”他猛抬头,镜片后的眼睛亮了,说:“买了张床垫,等送货的人。”我告诉他送货的早往他家那边去了,他“啊”了一声,咧嘴笑出个月牙,慌慌张张就往回跑,活像个怕错过水果糖的孩子。

爱人工作安排、评职称的烦恼,可能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烦心事,红柯终究不想在母校待下去了。陕西师范大学要调他,他来办公室找我,眯着眼,语气却比往日坚定:“领导开会时,您不要发言挽留我。”那时我已退居二线,其实没有发言的机会了,但我懂他——新疆的风、文学的魂,让他不愿再困在这个老地方。

临走前,宝鸡市委副书记设宴为他送行。他紧张得像个孩子,说“从没和这么大的官一起吃过饭”,非要我作陪。宴席上,市领导们为流失这样的人才深感惋惜,红柯却话不多,只顾低头吃饭。只有说起新疆的草原戈壁、笔下的人物故事时,他眼里才会泛起光,滔滔不绝地说上一阵。那一刻,他不是局促的杨宏科,而是在文字里自由驰骋的作家红柯。

去了西安后,他当了陕西省省政协副主席、陕西师大博导。有次我去西安,试着给他打电话,本想简单问候,没想到他放下电话就打车赶来,推掉所有事务专程接待。点了八盘菜,我说太多了,他认真道:“齐了呀,叔。”给我倒上酒,语气郑重:“得把你招待好。”原来他一直把我当长辈,所以要尽晚辈之道。

后来他挂职宝鸡高新区副区长,我们住得很近,我却一次没去找过他。不是不想见,是怕——怕他又推掉所有事,摆上一桌子菜忙前忙后。我知道他待人实在,越是这样,我越怕添麻烦。

突然听说他走了,是心脏病。1962年生人,2018年2月24日离开了这个他无限热爱又偶感烦扰的人间,才56岁。电视里播着他的追悼会,贾平凹先生致悼词,送行的人黑压压一片。

学界说他是陕西继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之后的文学黑马,开创了边疆诗化叙事风格。可我总想起校门口那个低头转悠的身影,想起他听到床垫送到时猛地抬头的样子——镜片后的眼睛弯着,嘴角咧得大大的,带着孩子气的雀跃。那笑容刻在脑子里,一闭眼,就清清楚楚地对着我。

杨宏科啊,今天是八月十五,我想起你叫我“叔”的情况。每逢佳节倍思亲,咱们是有亲情的,叔想你了。

你没离开。我仿佛看见你踏上了西去的列车,飞驰过嘉峪关,去大西北寻找骑手;又仿佛看见你带着采访本,行进在天山脚下,奔波在大漠戈壁。在那片你深爱的土地上,你永远走着,写着,眯眼笑着。

作家红柯一二三事

□赵博

老家的路灯(小说)

□江月卫

1 四叔决定对寨子里的路灯进行一次彻底维修,每逢节庆,外出打工的要回来,上学的也要回来,天井寨一下子就热闹起来。好些年前,政府投资十多万元把连接每家每户的路灯给开通了,但日常维护的事还得自家负责。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地风吹雨打,莫说路灯,就是人也难免有个伤寒感冒。

四叔在寨子的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消息,提议大家出点钱,对路灯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整修。

天井寨原本是一个行政村,只有一百多户四百多人口,四叔曾担任村长。如今,与相邻的几个村合并成一个大村后,天井寨成为一个村民小组,四叔便成了村民小组长。

见老半天没有人回应,四叔这才想起来,上午10点大家都在上班,忙得不可开交,哪有空回!寨子里的人大多在大城市里打工,不像自己这般自由随意。

四叔今年62岁,二十几年在村子里当民兵营长,后来当治保主任,当村长、村支书,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天井寨,可以说是天井寨的见证人。四叔一天到晚有忙不完的事。就拿路灯这事来说,这些年就够。

四叔操心的。当年路灯尚未安装定时器,每天早上按时开,晚上按时关,一不留神就会超时,就会有人提意见浪费了电。后来安装了定时器,到了设定时间,路灯齐刷刷地准时亮起和熄灭。这时,四叔还要按时开启和关闭寨门的两个高音喇叭。

有了灯光和声音,整个天井寨变得鲜活起来。

2 天井寨最早安装路灯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会儿刚通电不久。土地也刚刚下户,天井寨人激情高涨,清晨伴着星光出门劳作,夜晚披着月色返家。收入日渐丰满,小偷小摸也趁火打劫。一天夜里,玉跛子起来解手,发现牛圈里的牲畜不见了,忙扯着嗓子大喊:有人偷牛——刹那间,整个寨子里男女老少齐上阵,可因昏暗无光,人看不清彼此,最终强盗还是从

四叔身边跑掉了。

如果有路灯,强盗肯定跑不掉。这年底,全寨人举手表决,把当年集体林场的分红用于在主要村道上安装路灯。晚上,从对面山坡看天井寨,灯光星星点点,有点像天上的北斗七星,天井寨成了附近十里八寨的榜样。可到年底结算电费时,花费不菲,大家又心疼不已,关掉开吧,路灯长期闲置,也极易损坏,维修费用将远超电费。最终四叔提议,路灯每晚开启两小时,天黑时开启,就寝时关闭。哪户人家离哪盏路灯最近,就将开关安装在哪户人家,由该户负责路灯的开与关。

村人们入睡时间参差不齐,这完全取决于每个家庭的生活习惯,不可能一声号令便全部熄灯,甚至有人还会忘记关灯,让路灯亮至天明。第二天,四叔便会加以批评,被批评者往往态度诚恳,说:“好的好的,这几天活儿太多,一上床就睡着了。”然而到了第二天晚上,他们依旧会忘记,灯泡也常因此被烧坏。此后,这盏路灯大半年都未能亮起。

渐渐地,村人们的收入宽裕了,不再吝啬那点电费。再后来,又有了国家的投入,路灯便更加规范漂亮起来,每家每户门前都有了路灯。

夏日,路灯亮起。寨子里的女人吃过晚饭来到鼓楼里,做起了针线活,这是她们暗自较劲的一项活儿。她们一边绣着花鞋垫,一边望着月亮缓缓从山梁滑落,骄傲地对别人说:“咱们绣出的山水花草是世界上最美的。”

瞧见自家的媳妇坐在那里,男人们带上扑克围拢过来凑热闹,只为消遣时间的同时给生活寻求些许小刺激。遇上有争论的时候,他们便向坐在旁边绣着花鞋垫的媳妇求证。媳妇们只顾着手中的花鞋垫,没留意男人们手中的牌,打着圆场敷衍道:“没错没错,都没错!”

这是很长时间里,天井寨夜晚的光景。

3 长光安葬完母亲之后,在乡里的市场旁边租中了一块地,售价为10万元。众人啧啧感叹:“长光有眼光啦!这几年在深圳打工发了财。”敬权一直在浙江开餐馆,

也在县城购置了一套商品房。受他俩的影响,整个天井寨的人陆续在外添了房。四叔的儿子也在乡里的集镇上建了房,儿子去浙江打工后,要四叔去照看集镇上的房子,但四叔说天井寨不能少了他,他不能离开。

有人说,整个天井寨的人几乎都搬到了集镇,这集镇啊,该改名叫天井寨,四叔去当村长吧。四叔笑着回应,集镇上的好多人确实来自天井寨,可这地盘并非天井寨的,他只管地盘,不管人。说罢,他自个儿哈哈地大笑起来,笑得眼角都泛起了泪花。

清明节,人们从四面八方纷纷涌回天井寨。这是村子里除春节外最为热闹的日子。大家在杂草丛生的山头寻觅着自己的祖先,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相互寒暄、客套,脸上满是克制的神情。他们宛如远道而来的客人,对这片地方既熟悉又陌生。

十来岁的孩童虽都是老祖宗的子孙,彼此间却互不相识,更不清楚他们共同的祖宗叫什么名字。他们顺着长辈的指引一路前行,不了解天井寨有多少户人家,还有多少亩良田。他们只知道,这里有祖传的几块墓地,这里曾是他们的故乡。

趁着大家都在,四叔提议道:“不少路灯都有点故障,咱是不是全面检修一下?如今的路灯都很先进了,听说路灯上方有块板,太阳

照射一天,就能亮一个通宵。这个新型路灯挺节省电费的,这会儿整修,国家也有补贴,咱是不是趁这个机会换换坏掉的灯?”

长光率先表态,说:“做个预算吧,看看需要多少钱,大家凑一凑,这钱就有了。”

四叔早已算好账,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摸出那个破旧的笔记本,戴上眼镜翻到最后的几页,说:“我算了下,平均到每户上,除了政府的补贴外,大概要300块左右。”

长光说:“我赞助两万,这样乡亲们能少花点儿。虽说我们不住在寨子里,但这里是我们的根,我们不能忘了这里是我们的胞衣地。”

也有个别人提出反对意见:“我们都不住在寨子里了,路灯安着还有什么意义?”

立马就遭受大家的攻击:

“老话讲,吃饭不离老屋场,就是到了天涯海角,我们的家还是在天井寨!路灯亮着,咱节假日回家时才亮堂。”

“我们虽然人走了,心永远是搬不走的!”

……

还别说,这事儿很快有了着落。端午节之际,路灯终于悉数修完。

望着夜晚明亮的村道,四叔欣慰地笑了。那一盏盏路灯,宛如伫立在村口翘首以盼的老母亲,满心期待着游子归家团聚时爽朗的笑声。

